

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

■ 楼继伟 财政部部长

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根据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测算，1980年—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34%、43%和35%，我们和日本比较高。这是我们改革开放高速增长的时期，主要来自于要素数量的增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近来情况有些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劳动生产率在停滞，看到有一些国家，我们认为不太行，实际上提高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日本，日本（从）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三个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0%、66%、167%，我们说日本停滞了20年，实际人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20年，不然的话，它的人口在减少等一系列问题矛盾会更突出。我们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在停滞。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显著地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劳动者利益，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推动工资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另外一点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是立足于标准工时制的，实际上外向型的代工制的是灵



活用工，不可能签订长期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能力极早地退出。我们早晚是工资上涨最后要退出，但是退得太早了。

企业有一个成本问题，必须签订长期合同，如果我没有订单了，我先让你回家，有订单了再招回来给你一个临时合同，那不行做

不到了。

第三，法律强化了对现有工作人员的保护性保护，再一个对于寻求更换工作的劳动者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构成了实质性的歧视，造成劳动力市场下滑，其中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损害很大。

第四点，再一个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

资的意愿。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现在企业最缺的是技术员工，为什么缺呢？企业不愿意培训，因为职工可以不说任何意愿和原因（而）提前通知企业，就可以走人——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业让他走要支付大量的费用，所以技能工人难招。工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进行技能培训，往往倾向于将操作经验积累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因此）无法满足技术公信的要求。所以逼得以后出来一个劳动派遣工的制度，这个制度更不利于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合同法在企业内部推行集体谈判制度我认为是对的。在一个劳资双方比较平衡的制度下，个体劳工是弱势的，所以应该推行集体谈判制度。劳动合同法还规定推行区域级谈判和行业级谈判，这个幸亏没有执行，要是执行的话我们将陷入南欧诸国那个悲惨境地。

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调整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劳动者的条款原则保留，把过于僵化的部分剔除，体现双方面的平衡，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说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推行太慢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人无常心他就不愿追求技术，早晚要走掉，企业不愿意培训人，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法律的基础要及早研究。

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

■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我围绕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话题讲三个观点。**第一关于效力与活力。**有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帮助我们认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哈耶克（音译）论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的有效使用。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那年正是中国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而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在中国成为共识。由于20世纪一个核心争执是计划与市场，所以哈耶克很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另一位是熊彼特，他是最早论述企业家精神，也称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通过重新组织资源来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过程，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以后日益变大。由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莫斯说过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从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到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的活力，使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渐深化，效率与活力既相关又不同，效率更多的是指在现有技术和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结合，而活力更多的是指改变现有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使得企业更有生气。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的，效率与活力的结合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关于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讲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需要区别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区分管理者与企业家。一方面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也不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把企业管好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创新，企业家精神不是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要创造出与前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过程。反过来一个好的创业者也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比如说乔布斯开始是一个创业者，但是他在1985年被苹果公司解雇，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接替他出任苹果公司CEO的斯卡里（音译）是好的管理者，但是不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乔布斯在1997年重返苹果的时候，他的企业管理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好管理者。我讲的第二个观点，要注意到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在我们重视企业管理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在我们鼓励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同时，更要推崇优秀的企业家。

第三，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企业管理是很难避免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的，而企业家精神与官僚主义是不相容的。熊彼特在提倡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他担忧日益增强的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会扼杀企业家精神，从而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今天虽然企业家精神仍在，但是他当时所担忧的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在我们提倡企业家精神，提倡创业精神，注重企业活力的时候，同时也必须要减少官僚主义，也就是要简政放权。这就是为什么简政放权与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理论上讲，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可以包括国有企业。不过因为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束缚，所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活力需要更大的努力。计划经济的传统，使我们更容易依赖政府推动创新，但是企业活力必定主要靠企业家精神。在激发企业活力中，虽然政府应该发挥推动作用，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依然是压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活力的主要障碍。这是我讲的第三个观点，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简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束缚。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最集中体现的地方是深圳。深圳是企业有活力，创业企业多，企业家精神强的地方；同时深圳也是政府干预少，政府服务意识强的地方。深圳经济在当前全国经济下滑中表现凸显，深圳的案例极具启发性。当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区，是践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先行者，如今深圳也成为释放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先行者。深圳用事实说明了企业的活力来自于创新驱动发展的供给侧，创新更多的依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所以我今天讲的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也有事实依据。



关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做好总需求管理

■ 易纲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目前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它需要时间，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间含义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长期的含义。而整个需求侧的管理，它的重点是在解决总量的问题，需求侧的管理主要指短期调控，是短期问题。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它们两者的关系有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判断。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它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它是一个配合的政策。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一个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所谓适度就是把握好度，那么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我想有这么三个把握：第一个把握就是说总需求管理，要使它不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个考虑，不出现流动性比较大面积的紧缩，守住这三条线。那么很显然，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那么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

要避免过多地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同时，我想强调的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总需求的管理，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很多结构性改革，它产生了紧缩效应。我们历史有很多，大家随便可以举出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在很多危机中，国际货币组织进去，说你紧缩财政，实现财政可持续就是紧缩，造成这个国家需求进一步紧缩，有的陷入通缩的螺旋中。认识到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的管理，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然后我们看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实际上有破有立，当前我们认识到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供给过剩——钢铁煤炭是供给过剩，同时供给不足，马桶盖，海外的大量的购物，显得你有一些产品供给不足。同时我们存在需求不足和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两种情况也在并存。我们是不是要扩大需求？是，我们需求有可能不足，要扩大需求。同时我们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国内需要改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让所有人不能比原来更坏，或者比原来更好或者不动。从经济学的角度，什么是总需求，什么是总供给，什么是供给侧，什么是需求方。

第二方面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度在什么地

方？我刚才说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在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都产生了一些紧缩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你把握这个度，不能产生债务通缩紧缩的这个螺旋，第二个度，不能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业。现在我们的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16—59岁劳动力人口结构在下降，所以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进行这样的改革。同时我说，要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而且还要有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下面我说一下总需求政策的管理分工。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的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最后我讲一讲，有一些补短板政策，我们在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看起来是供给侧的改革，我想强调的是，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也是扩大总需求的，也是可以需求方入手来观察这个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你要给一些老百姓符合棚户区改造货币化的条件，一个是政府盖房子，让这些人到政府盖的房子里面；另一个给这些老百姓货币，分在一个账户上，让老百姓按照程序去选择在城市买房，买的可以是政府盖的房子，也可

以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老百姓可能买到更适合他的房子——更适合他的朝向，更适合他的地点，同时可以加一点钱。货币化看上去是一个去库存的供给侧的改革，但是实际上如果把这个库存去掉了，也可以增加房地产的投资，也可以扩大总需求。同时棚户区改造以后，还会产生家具、家电、装修这些消费。

第二个补短板的例子，比如说扶贫。我们可以精准算一下今后5年，每年要一千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这里面实际有很大的消费拓展的空间。

回到我讲话的题目，在供给侧需求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管理。我们就要算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产生多大使经济向下的压力，让我们在需求侧，把这些压力补上，给它补齐了，补齐的上限不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以我做的功课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说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产生一些经济向下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算出来，比如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刚才讲了主战场，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外，我们通过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降低五险一金，鼓励个性消费，可以补充一些GDP的总需求。在我这里补了0.75个百分点，大数就是五千万人民币的概念。这样就比较好控制在改革的同时我的总需求，我的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同时又不产生过热，又不产生其他的道德风险。

起的时候，常常被人理解为供给侧的结构的调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的，需要加以改进的，就是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好像有点脱节。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准，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有一些指导意见和配套方案之间不衔接。我跟电力部门的人做了一些讨论，指导意见大体上回到2002年的五号文件，这种现象很明显。好像国企改革指导文件和N个配套文件也有这个问题。最近一个月以来，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迷雾。这种批评有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就像习近平总书记1月11日中央深改小组会议上讲的，今年一定要力争把新体制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牢牢抓住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目标落实主体责任，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职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我希望或者我建议，我们的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要充分协作，一项一项的改革，来研讨它的进度，它原来的设计是不是有改进的地方，在我们执行过程中有哪些堵点要补充。

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想讲四点意见。第一点意见，去年11月份中共中央提出来的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推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来保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要改变。

过去长期中，主流思想是由需求侧的因素分析去勘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应该说超过警戒线了，到现在还在继续提高，这样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再继续应用这样的方法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了）。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好多年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对于讨论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不应该使用需求侧的分析，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对于中长期发展来说是无效的，而且弊端很大。

第二点，从需求侧的分析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GDP总量和需求总量，和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相等的，是恒等的。但是要分析GDP总量变化的时候，你可以从需求侧去分

析，也可以从供给侧去分析。刚才易纲的PPT里面有一个图很清楚，一边是需求侧诸因素，一边是供给侧诸因素。供给侧因素主要就是从增长来说，一个是新增劳动力，第二是新增资本投资，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从这个分析提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振荡，我们为什么发生经济增长减速？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有很多文献研究，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吴晓灵教授的研究，都系统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振荡下，处方就是说通过纠正资源的误配置，就是结构恶化；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

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其实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所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第三点，加快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正式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在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10年以后，就是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进展这么慢？当时给出的结论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我当时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的决策》，这里面详细讲了当时有哪些体制性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

那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怎

么才能解决呢？那就是要靠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来消除这些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市场在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第四点，从三个月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在执行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是亟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部门企业流出来，转向供过于求效率较高的部门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好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因此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调结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很少用，但是西方有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欧洲国家力推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些文献，当时结构性改革说的是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就是我们说的体制改革。但是和我们供给侧联合在一